

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的 绍兴出版人群体及其形成原因

吴心怡

摘要：绍兴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绍兴，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绍兴籍人士。绍兴出版人群体主要由创业人士、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组成，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绍兴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和深厚文脉的延续，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自古以来兴旺发达的绍兴藏书业和刻书印刷业，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重要物质依托；乡情乡谊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地缘因素。该文提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用自身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将绍兴的文化底蕴带入到现代出版活动之中，在推动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到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

关键词：现代出版业；绍兴出版人群体；构成与规模；形成原因

作者简介：吴心怡，女，编辑。（西泠印社出版社，浙江 杭州，310014）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5-0111-07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现代出版业时期，也是我国民营出版业最为辉煌的时期，这种繁荣兴盛由无数中国出版人的努力所铸就，其中就包括为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绍兴出版人群体。

本文中的“绍兴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绍兴，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绍兴籍人士。对于现代出版业背景下的绍兴出版人，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个体性研究成果，但将这些个体研究集成“绍兴出版人”进行群体研究的成果，则几乎是空白。笔者以“绍兴出版人”“绍兴出版家”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里进行全文检索，仅检索到一篇名为《近代绍兴出版家的出版经营理念》的论文^[1]，该文对沈知方、章锡琛和陆高谊三位绍兴籍出版人士及其企业的融资方式、企业管理和广告宣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并未展开对绍兴出版人群体作研究。因此，笔者尝试对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这一重要的地域性群体进行整体性的初步研究，并对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一、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构成与规模

鉴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绍兴出版人进行过群体性的研究，笔者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首先对绍兴出版人这一群体从规模和构成方面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本文中所涉及的绍兴行政区划，是以民国时期为依据，包括了当时属于绍兴行政区划的余姚（今属宁波）和萧山（今属杭州）两地，这与当今绍兴的行政区划有较大区别。

（一）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构成

对于绍兴出版人群体，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设定一个基本的人围标准，并不是说只要曾在出版机构里工作过就属于出版人群体，而是必须至少在出版机构建立、管理、运营之中的某一方面，发挥过核心作用或担任过重要职位者，方可将其囊括在内。从这一意义出发，在出版机构中仅从事基础性工作者不能计入出版人群体。根据这一标准，笔者认为绍兴出版人群体主要是由创业人士、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这三类人构成。

1. 创业人士

创业人士指的是出版机构的创办者，这里特指民营出版机构的创办者。在中国现代出版史几十年的发展阶段内，中国境内先后出现过大量的官办与民营出版机构。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民国时期有 8000 多家出版单位。”^[2] 去除官办的出版机构之后，剩余民营出版机构中究竟有多少家是由绍兴人创办的，相关文献中没有明确数据，难以统计。不过，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从中国现代出版业核心格局中的绍兴出版人，来进行考察和估算：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是上海，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于此，其中公认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号称“商、中、世、大、开”的五大书局，它们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五大书局占据了当时中国每年新出版物的大半壁江山，据统计，在 1934—1936 年间，仅前三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物的平均数则占同期间全国出版物的平均数百分之六十五”^[3]。所以，五大书局当之无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而其中绍兴出版人与五大书局创办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商务印书馆于 1897 年创办。在五大书局中排名第一的商务印书馆，虽然其创办者并不是绍兴人，但其骨干成员也即高管人士中有不少绍兴人，他们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下文中有论及。

中华书局于 1912 年创办。中华书局共有五位创办人，其中有一位是绍兴人沈继方。沈继方（？—1916）曾经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保管股长，掌管印信、合同、票证等要件，属于商务印书馆重要的高级行政人员，后脱离商务印书馆参与创办中华书局。^[4] 沈继方去世较早，文献记载中有关他的资料很少，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考证，推测他可能与世界书局的创办者绍兴人沈知方为兄弟关系：“沈知方（字芝芳）和沈继方（字季芳）的关系，从姓名字号上看，大约是兄弟。”^[5] 中华书局亦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享有盛誉、具有领航者地位的出版机构，其高管人士中也有许多绍兴人。

世界书局于 1917 年创办，创办人是绍兴人沈知方。沈知方（1889—1939）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后转入中华书局任副局长。沈知方被誉为现代出版界的奇才、怪才，他善于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不断快速转型，营销策略层出不穷，在中华书局任副局长时已崭露头角：“沈知方对中华书局的主要贡献在于别出心裁地促进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多家分局，用最少的资金和人力，满足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发展迅速的需要。”^[6] 待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后，他以出版新式教育教科书为突破口，加入到教科书的市场竞争之中：“原来受商务、中华两家控制的教科书市场被突破，化为商务、中华、世界鼎足而立的局面。”^[7] 沈知方的策划与营销战略一战成名，一举将世界书局带到排名仅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出版机构。“沈的书业学徒背景和敏锐市场嗅觉，使得世界书局的出版物选题，十分注意走大众化路线……在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儿童读物、哲学社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主要出版领域，均有不凡的文化建树。”^[8] 1950 年，世界书局宣告停业。

大东书局于 1916 年创办，共有四位创办人，其中有两位是绍兴人——王幼堂与沈骏声。王幼堂（生卒年不详）曾在中华书局担任协理^[9]，大东书局开办时担任总店店长，后来他又创办了九州书局和东方文学社两家小型出版机构。沈骏声（1894—1943）是沈知方的侄子，担任大东书局经理。四位创办人中，“沈骏声最年轻，精力充沛，因此他肩负的责任也最繁重，他为大东书局的逐渐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10]。沈骏声有一段传奇经历：由于大东书局的印刷技术和质量在业内享有盛名，因此承担了为政府印制钞票和印花税票的业务。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大东书局将印制钞票的工作转移到香港进行，不料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沦陷了。沈骏声在日军即将到来之际，于逃难之前的深夜亲用手用铁锤将印制钞票的母版砸毁，埋在地下，以免落入日军之手。^[11] “大东书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集出版、发行、销售为一体的机构……主要出版有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12] 1954 年，大东书局被拆分，下辖各部门按其所出版图书的类别，分别并入其它出版社。

开明书店于1926年创办，创办人是绍兴人章锡琛、章锡珊两兄弟。章锡琛（1889—1969）曾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期刊《妇女杂志》任主编，开明书店成立后担任经理等职。“在民国时期的民间出版销售机构中，开明书店以雄厚的实力和充满文化气息的出版物而名列前茅”^{[12]（127）}，“因作风严谨，倾向进步，受到教育界、文化界的赞誉”^[13]。新中国建立后，章锡琛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等职。章锡珊（1891—1975）曾在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担任会计主任，开明书店创办后担任协理、发行所所长等职，著名的《开明活叶文选》与他的策划开发和直接参与密切相关。章锡珊虽也是开明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但他为人低调，关于章锡珊的文献资料寥寥无几，后人评述说：“作为绍兴马山镇章家的老二，锡珊先生应有的故事似乎都被其兄锡琛先生占去了。”^[14]开明书店在20世纪50年代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2. 高管人士

高管人士在本文中指那些在出版机构里从事业务经营或行政管理的中高级以上职位人士。这类人士中绍兴人数量相当多，构成了绍兴出版人群体的主干力量，他们遍布于各出版机构内，其中有些人在出版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出版机构的创办者，因而在现代出版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列举其中几位著名人士：胡愈之（1896—1986），他的出版活动经历非常丰富，18岁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参与推动创办著名的生活书店，先后主持和创办过多种报刊杂志，策划出版《鲁迅全集》，“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5]，新中国建立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杜亚泉（1873—1933），他曾经创办过《亚泉杂志》，这是由中国人独立主办的第一份自然科学类刊物。1904年，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理化部主任，任职长达28年。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理科类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后又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刊物《东方杂志》的主编，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辉煌业绩有着他的巨大贡献。杜亚泉以他的出色业绩和启蒙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的重要人物。他去世之后，胡愈之在悼文中称其“虽然没有替遗属留下物质的遗产，却已替社会留下无数精神的遗产了”^[16]。陆高谊（1899—1984），他自1934年起担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在1939年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去世后，陆高谊领导世界书局度过了艰难的抗战阶段，新中国建立后曾出任财经出版社社长。^[17]范洗人（1882—1951），长期在开明书店任职，抗战期间开明书店不断搬迁，艰难维系，在这最困苦的时刻，他出任开明书店总经理之职，《故总经理范公事略》一文对范洗人在此期间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公司全责，悉以畀公，盖其颠连播越，与抗战相始终，开明垂绝之业，得维系不坠者，固全体同仁矢志竭诚，群策群力，有以致之，而公休休有容，指挥若定，其功实有足多，宜畅尽厥施也。”^[18]

3. 跨界人士

跨界人士并非以出版为主业，因而通常在提到这些人士时，人们首先并不是将他们作为出版界人士看待，但在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发展道路上，曾经有过在出版界工作的经历或从事过相关活动，并且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跨界人士中多为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书画家或各界的文人学者。绍兴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享有盛名，近现代历史上同样名人辈出，绍兴出版人群体中的跨界人士可谓星光灿烂，辉映着现代出版史的前行征途。笔者在此列举几位其中的佼佼者以及他们的出版活动：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1868—1940），他于1902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主持新式教科书的编撰，他亲自编写的5册《中学修身教科书》被誉为“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智识水平，而且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19]。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者认为：“谈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是不能遗漏蔡元培先生的。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关心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对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20]文学家、思想家鲁迅（1881—1936），他介入出版活动时间长、程度深，“据初步统计，鲁迅在从事学术活动与文艺活动的30余年中，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有80余种，丛书11种……参与编辑的各种文艺刊物20种，在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5]（147）}。教育家、翻译家夏丏尊（1886—1946），1927

年,他应聘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后任编译所所长,“夏丏尊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通过出版,襄助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8]。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周建人(1888-1984),他的编辑出版活动包括先后在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担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编辑和《自然界》主编。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他于192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编译所史地部部长,主持翻译《大英百科全书》,主编《百科小丛书》。

(二) 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规模

创业人士、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构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的绍兴出版人群体,那么,这一群体究竟具有何等规模?若将其置于中国出版人整体阵容之中审视,能否彰显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气势与地位?

由于现代出版业时期年代跨度长达几十年,加上相应统计数据的匮乏,显然无法用量化的数字来进行精确统计绍兴出版人群体规模的具体人数。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研究著述的研读,根据其中的史料记载和某些数据,梳理出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群体在中国出版人群体中所占的大致比重,由此推测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规模。

宋应离等编撰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10卷本。鉴于现代出版业时期中国出版机构的内部机制和行业分工并不是细化和固定化的,经常出现某人身兼多职,既从事编辑工作又担任出版机构管理工作以及图书发行工作,所以该书使用了“编辑出版家”这一名称,书中共收录20世纪中国的编辑出版名家54人,其中绍兴籍为7人,占比13%。

吴永贵所著的《民国出版史》。该书的第六章“大书局重要出版人列传”和第七章“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共收录了民国时期重要出版编辑人士105人,其中绍兴籍为18人,占比17%。

姚一鸣所著的《中国旧书局》。作者对晚清到1949年间上海几百家出版机构进行了精选,从中选出50家重要的出版机构(书局)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绍兴籍出版人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共10家,占比为20%。

汪耀华编撰的《上海书业名录》。该书收录了不同年份上海出版机构的统计数据,其中“1935年上海市书店调查”一表,收录了1935年也即现代出版业鼎盛时期的上海261家出版机构的资料数据,其中包括这261家出版机构经理籍贯的信息记录,去掉其中外国籍和籍贯地不清的17人,剩下的244人中绍兴籍为27人,占总数的1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列出的仅是书店经理的籍贯,由于某些书店(出版机构)创建者的籍贯是绍兴人而聘用的经理却并非绍兴人,因而创建者的籍贯未能统计入表,所以,绍兴出版人的实际比例应该较表中统计的百分比还要更高一些。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的数据,笔者认为可以推算出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在全国出版人中的占比,这一占比大约在百分之十几。此外,还有一份值得一提的重要资料就是《浙江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浙江出版志》,该书“第十篇人物”之“第一章人物传略”,为古往今来浙江重要的出版人物立传,其中1840年之后出生的浙江出版界人物总共收录了223人,根据笔者统计,其中绍兴籍人士为59人,占比约26%——这一数据反映出在近现代浙江出版人的阵容中,绍兴出版人占到了其中的四分之一。

上述数据大致反映了绍兴出版人群体的规模,这一占比如果按照全国地级市的行政区划来排名的话,绍兴籍出版人的队伍规模当可排在全国第一。

二、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绍兴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精诚所毓,灵秀所钟。论人才,俊贤辈出,灿若群星;论文化,艺苑英华,散动中外”^[21]。绍兴出版人在现代出版业背景下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壮观的群体规模,既是绍兴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和深厚文脉的延续,同时也是绍兴人重视乡情乡谊、相互扶携

的结果。

（一）文化传统的基因延续

世纪之交的2000年，中华世纪坛在北京落成，中华世纪坛里精选了40位“中华文化名人”为其塑像立传，这40人中绍兴一地居然有4人入选（王羲之、鲁迅、蔡元培、马寅初），占到十分之一，充分展现了绍兴地区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和影响。这一地位与影响植根于绍兴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当年梁启超在探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时，就曾对当时绍兴地区下辖的余姚发出这样的感叹：“而余姚区区一邑，更笃生黄梨洲（宗羲）、朱舜水（之瑜）两大师，嘻！盛矣！”^[22]

清朝初年，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大兴文字狱，江浙知识阶层受到压制打击尤甚，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上升途径受到阻碍，绍兴的知识阶层被迫游走于社会政治的边缘地带。当代研究者认为，这种状态造成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文化边际人”，促使他们改变了“文化谋生取向”，从学者型向实用型转变，“沦于‘边缘状态’的江浙士人常常视应聘为一种‘谋生的途径’……使学术本身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而“这群‘边际人’出于地域之内声气相应的考虑，也会常常相互沟通引见”^[23]。

笔者认为，这正是有清一代绍兴著名的地域文化现象——“师爷文化”——盛极一时的社会大背景。“师爷文化”构建起绍兴文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入幕习幕”成为绍兴知识阶层拓展另一种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的尝试。在当时，幕僚或师爷的身份，能够有效地实现知识阶层所追求的保证经济利益、人格相对独立、空间流动自由这几项基本需求。随着清朝走向衰落，集合了这些特性的现代出版业，遂成为绍兴地区知识群体新的集聚之地。在出版界的天地里，他们得以继续行走在以学术为谋生手段的路径之上，“绍兴人在脱了师爷的长衫之后，在知识界牢牢占有一席之地”。^[24]因此，在中国现代出版业五大书局的核心格局下，绍兴出版人能够在其中占得大半江山，并非浪得虚名，而是有着代代相因的深厚文化传承。绍兴出版人中的许多人往往是兼具商人与文人身份，他们或是家学渊源久远，或本身就是饱学之士。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在绍兴出版人群体中，首领型的创业人士并不多，数量最多的是辅佐型的高管人士，许多出版机构的经理和高级行政职位都由绍兴人担任，这是否也可以视为绍兴地方色彩的“师爷文化”在现代出版业中的延续和体现？

绍兴文风兴盛，自古以来绍兴的藏书业和刻书印刷业兴旺发达，这亦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之物质依托。先看藏书业：绍兴乃私家藏书重镇，明清时期的藏书大家有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名气最大的当属嘉庆年代的黄氏五桂楼，为规模仅次于宁波天一阁的民间藏书楼，有“藏书之富甲越中”“浙东第二藏书楼”美称；建于清末的古越藏书楼，更是成为我国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再看刻书出版业：自古有刻印书籍以来，绍兴的刻书出版业在全国颇有影响，明清时期绍兴境内书坊林立，这些书坊的主人，“不仅创办书坊刻印，而且亲自兼事撰写和编辑，积极组织发行，推进了绍兴出版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25]。藏书业和刻书业的兴盛直接带动了绍兴旧书业的发展，1915年，绍兴人朱遂翔在杭州创办了抱经堂书局，这家书局以经营旧书为主，同时也从事翻刻古书的出版，“书局经营的宋、元、明善本、名人抄本、稿本达数百万之巨，吸引了南北书商及国内各大图书馆来杭采购图书”^{[15] [147]}，抱经堂书局因此成为杭州最有影响力的大书局。

中国现代文坛名人包天笑曾这样评价：“绍兴人对于书业有根底，向来对于旧书业有办法，现在对于新书业，一样有办法。”^[26]现代出版业的舞台，遂成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施展空间。

（二）地缘乡情的纽带联结

有研究者认为，民国时期的文人圈里有个“绍兴帮”，“帮主非蔡元培先生莫属”^[24]。蔡元培的“帮主”之名虽带戏说成分，但也有几分依据。蔡元培被认为是一个极重乡情乡谊之人，他有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吾辈之责任乎？”^[27]笔者以为，蔡元培所言的“吾辈”范畴，涵盖了现代出版业时期的绍兴出版人群体，尽管这个群体并不是某个具体的社团或同乡

会之类的实体性机构,但我们考察现代出版业的历史,却可以感受到“绍兴帮”的真实存在。地缘乡情,就是绍兴出版人群体的联系纽带。

笔者以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为例: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理化部主任之后,“引进杜山佳、杜山次、杜就田、寿孝天、骆师曾、章锡琛、杜其堡等绍兴籍知识分子,亲自在商务印书馆培育了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教科书编辑团队”。^[28]杜亚泉的这个团队,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内的“绍兴帮”。曾经的团队成员章锡琛回忆道:“理化部编辑员都是他的同乡,因而在编译所里被称为‘绍兴帮’。”^[29]著名作家茅盾在初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当编辑时,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理化部是绍兴帮,除了校对之类少数人也许不是绍兴人。”^[30]

杜亚泉的“绍兴帮”团队还只是存在于商务印书馆的某一部门,而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创办的开明书店就完全是绍兴出版人的大本营了。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先生曾这样评述:“开明书店乃是绍兴帮……在我们看来,‘开明’却是最富绍兴气氛的书店。”^[31]章氏兄弟极重乡谊,开明书店创办几年之后,章锡琛就聘请他的老师杜海生担任开明书店经理。杜海生是绍兴著名的乡绅,清末民初在绍兴兴办教育,是山会师范的创办人之一,章锡琛本人正是毕业于这所学校。^[32]章锡琛将乡情乡谊的感召力发挥到极致,集聚于开明大旗之下、先后在开明书店任职或从事出版活动的绍兴籍名师大家星光璀璨,如胡愈之、孙伏园、夏丏尊、周建人、邵力子、朱自清、刘大白等人,他们都是章锡琛的好朋友,又是文化素养和人生追求极高的优秀人士。正因为如此,开明书店虽然在五大书局中开办最晚,却迅速声名鹊起,对老牌大书局形成强大竞争压力,“在‘商务’老板心目中……‘开明’才是他们的劲敌,因为‘开明’是属于绍兴体系中,稳扎稳打,一步一步要爬上来的”^{[31](185)}。

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乡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是增强他们凝聚力的重要因素”^{[28](80)}。这方面的案例也相当丰富,笔者试举两例。其一:孙伏园,他号称中国的副刊大王,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物之一。绍兴籍著名作家、教授章廷谦当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时,经常给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受到他的提携;作为学生的章廷谦又与正在北大任教的鲁迅结识,得到鲁迅的指导与帮助;章廷谦之后的人生之路从此与孙伏园和鲁迅结缘。1924年,章廷谦与鲁迅、孙伏园发起创办著名的《语丝》杂志。其二:胡愈之,他18岁就来到上海进入出版界工作,从一个练习生起步,努力打拼,终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上虞家乡的青年以胡愈之为学习楷模,到上海求职就业遇到困难也会寻求他的帮助,胡愈之始终保持待人敦厚温和的秉性,极具感召力和凝聚力,“凡是从上虞家乡来上海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得到过他生活上的帮助和对于人生之路的指引。胡愈之成了在沪上虞青年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33]。

三、结 语

出版业是商业,出版人的行为自然也是商业行为,然而他们生产制造的产品是特殊商品,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绍兴出版人群体受千百年来绍兴地域人文大环境的渗透浸润,深得其文化精髓,他们用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把绍兴的文化底蕴带入到现代出版活动之中,在推动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这种地缘文化带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绍兴出版人群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本文仅仅涉及了这一群体的构成、规模以及形成原因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夏慧夷. 近代绍兴出版家的出版经营理念 [J]. 今传媒, 2015 (5).
- [2] 汪家熔.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321-322.
- [3] 王云五. 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 [A]. 张静庐.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乙编 [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337.

- [4] 罗智国. 近代中国书业的非凡时代 1905-1937 [M]. 合肥：黄山书社，2017：58.
- [5] 钱炳寰. 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 [A]. 宋原放编，汪家熔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 [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85.
- [6] 李雅，游雪雯. 中华书局管理者群体及其事业 [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4）.
- [7] 叶再生. 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436.
- [8] 吴永贵. 民国出版史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29-130.
- [9] 朱联保. 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情景 [A].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C].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96.
- [10] 孔繁丹. 大东书局概况 [A]. 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上册 [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68.
- [11]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1907-1949 下册 [C].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972.
- [12] 姚一鸣. 中国旧书局 [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123.
-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180.
- [14] 汪耀华. 书道 [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93.
- [15] 寿勤泽. 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147.
- [16] 胡愈之. 追悼杜亚泉先生 [A]. 宋应离等. 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第1册 [C].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356.
- [17] 王永源. 怀念陆高谊先生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C]. 绍兴：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8：257.
- [18] 王湜华. 玄妙观中三年少 [M]. 北京：华艺出版社，2013：119-120.
- [19] 石鸥，张斯妮.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2）.
- [20] 汪家熔. 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 [A]. 蔡元培等.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78.
- [21]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市志（第一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序二.
- [22] 梁启超. 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A]. 梁启超全集（第十二集）[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76.
- [23] 杨念群.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75.
- [24] 孙昌建. 民国有个绍兴帮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167.
- [25] 林光德. 绍兴印刷史话 [M]. 绍兴市印刷行业协会出版，2007：45.
- [26]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续编 [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278.
- [27] 周菊芳.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17.
- [28] 吴小鸥. 启蒙之光——浙江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 [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80.
- [29] 章锡琛. 漫谈商务印书馆 [A].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12.
- [30] 茅盾.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生活 [A]. 北京出版社. 编辑杂谈 [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7.
- [31] 曹聚仁. 书林三话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85.
- [32] 绍兴鲁迅纪念馆. 鲁迅与他的乡人二集 [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75.
- [33] 陈秋强. 上虞乡贤辈出原因初探 [A]. 赵畅. 上虞文史资料选粹 [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27.

[责任编辑：高辛凡]